

孟加拉本土期刊中想象与现实中的中国 (1860年代至1940年代)*

[印度] 萨尔瓦尼·古普图 撰 李 睿 译

摘要：本文分析了19—20世纪孟加拉本土文学期刊中的中国形象，探索了那一时期中印两国在文化、思想和历史上的联系。通过考察知名和不知名作家的文章，揭示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印度知识界的影响，并探讨印度如何通过这些交流重新审视自身文化。强调从狭隘民族主义视角转向全球视野的重要性，呼吁当代印度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推动世界和平与文化共荣。

关键词：孟加拉文学 中国形象 中印交流 民族主义

探究和讨论成就中国之伟大的品质和信念的热切冲动，自19世纪下半叶起，一直是印度思想史的重要部分。这与精英阶层中兴起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息息相关。孟加拉本土文学期刊中对亚洲及其与世界关系的讨论，旨在教育读者树立世界主义视野，尽管20世纪起民族主义的底色渐显。^①中国始终处于讨论焦点。作为一个亚洲强国，中国从古至今都与印度维系着精神和物质联系。关于中国的讨论既来自赴华旅行者，也来自依托中国古今相关文献进行虚构写作的作者。这些作者身份多元、关注各异，但存在某些本质的共性，或许触及中印交流的普遍性原则。为了解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রবী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

* 作者系印度加尔各答内塔吉亚洲研究所亚洲文学与文化研究教授；译者系北京大学南亚学系2022届硕士。

① Sarvani Gooptu, *Knowing Asia, Being Asian: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in Bengali Periodicals, 1860-1940* (Delhi: Routledge, 2022).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所说的“伟大的东方品质”，笔者从流行的孟加拉文学期刊上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中，梳理出基本趋势。这些品质应被所有亚洲人内化，以对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笔者认为，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所表现的思想理念，源自半个多世纪前并延续至今。

在“团结意识觉醒的新亚洲”^①思想的演变中，泰戈尔主张运用“东方视角”分析亚洲人的品质，尽管他并不认为这些品质只适用于亚洲人。要完善人类的普遍理想，必须保持各国独特性，又承认所有国家都具有伟大品质。^②但“东方视角”很独特，因为“东方通过感知个体领悟无极”^③。经由知识分子在本土期刊中的著述可以追溯到：在二十世纪期间，随着视角的变化，两国的差异时而抹去，时而被强调；然而通过强调对印度人乃至全亚洲同胞来说都很重要的理念和理想，物质和精神上的联系始终得以维持。在孟加拉知识分子和记者的著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正是这些共同的理念、从古至今在贸易、宗教和文化上的联系以及一种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现在提及“亚洲连接”这个概念，很难想象没有中国或日本的积极参与。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印度人眼中这两国各自独立（甚至连泰戈尔1917年在《民族主义》中也提出东亚“追寻自己的道路，发展自己的文明”^④），除非刻意冠以“亚洲”之名来彰显与印度的光荣纽带。对中国及其人民的好奇心从孟加拉媒体（报刊）兴起之初就已显现。尽管20世纪初日本的迅速崛起曾激起热潮，但关于中国的文章数量一直稳定不减。这些文章发表在《妇女启蒙》《妇女》《深闺》

① Rabindranath Tagore, “Appendix”, in *Japan Jatri (Traveller to Japan)* (Calcutta: Visva Bharati, 2013), p.174.

② Rabindranath Tagore, “To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Japan”, in *Japan Jatri (Traveller to Japan)*, *op. cit.*, p.117.

③ Rabindranath Tagore, “Appendix”, in *Japan Jatri (Traveller to Japan)*, *op.cit.*, p.175.

④ Rabindranath Tagore, *Nationalism* (Calcutta: Rupa and Co), 1992 (1917), p.29.

和《孟加拉的拉克希米》^①等面向女性读者以及《印度大地》《侨民》和《欢喜市场报》^②等面向大众的文学杂志上。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游记，记录赴华者的见闻。另一类本质上是新闻性的，兼具教化意图，在时代背景下剖析构成中国本质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能助力中国应对困境、重振辉煌，也为重建中印联系提供契机。

这些文章赞扬的品质包括纪律和毅力、坚定和自尊、传承传统、孝道以及爱国。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通过西方文献了解中国，往往试图发挥想象力吸引读者。然而有趣的是，赴华旅行者们也希望从自身遭遇中验证这些品质。最早的文章从19世纪60年代起刊载于《妇女启蒙》，涉及中印女性异同，有时同情中国女性被传统束缚的困境，但始终强调那些印度人易于采纳的普世优良品质。1867年，一位匿名作者为教育印度女性写道：“中国女性总是衣着得体，外表精致。富裕妇女外着绣花丝绸长袍，内着衬裙和类似加格拉^③的内裙，脚着鞋履。年轻女性留着长辫，已婚妇女则盘起发髻，用花朵珠宝装点……有些妇女在脸上抹白粉红脂以增姿色。”^④

1886年，一篇文章描述了对印度人来说独特的中国孩童养育过程

-
- ① 《妇女启蒙》(বামাবোধিনী পত্রিকা, *Bamabodhini Patrika*) 是1863年创立的孟加拉语女性月刊，旨在通过教育提升孟加拉女性的精神和社会地位。《妇女》(মহিলা, *Mahila*) 是1895年创立的孟加拉语女性月刊。《深闺》(অন্তঃপুর, *Antahpur*) 是1898年创立的孟加拉语女性月刊。《孟加拉的拉克希米》(বঙ্গলক্ষ্মী, *Bangalakshmi*) 是1925年创立的孟加拉语女性月刊。——译者
 - ② 《印度大地》(ভারতবর্ষ, *Bharatvarsha*) 是1913年创立的孟加拉语月刊，著名剧作家德维金德罗拉尔·罗伊(দ্বিজেন্দ্রলাল রায়, *Dwijendralal Roy*, 1863—1913)担任首任主编。该杂志内容丰富，对孟加拉语言和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侨民》(প্রবাসী, *Prabashi*) 是1901年创立的孟加拉语月刊。泰戈尔自1914年起的许多重要作品经常在《侨民》上首发。该杂志在推广泰戈尔的作品和思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其文学和文化内容，以及支持和宣传孟加拉文艺复兴而享有盛誉，在20世纪初期印度孟加拉语文坛占有重要地位。《欢喜市场报》(আনন্দবাজার পত্রিকা, *Ananda Bazar Patrika*) 是印度ABP集团旗下的孟加拉语日报报纸，于1922年出版，在孟加拉语新闻界占有重要地位。——译者
 - ③ 加格拉(ঘাগরা, *ghagra*) 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印度女性裙装，常用于节庆、婚礼等正式场合，主要在北印度地区穿着。它是一种宽松的、通常到脚踝的长裙，通常与短上衣(ঢোলি, *choli*)搭配穿着。——译者
 - ④ No author, “Chin deshiyo Strijati (Chinese Women)”, *Bamabodhini Patrika*, 3(54), 1867, pp.678-680.

和习俗，比如三分发以及出生和入学时的多重命名仪式。“孩子们被赋予‘智者’‘博学之人’或‘大文豪’等含义的名字，因为中国人最重视教育。一旦他们完成学业并结婚，则会再次被命名，这个名字会伴随终生。”^①

直到20世纪，作者们仍在关注女性生活及其在家庭、社会中的角色，而中国发生的其他事件则往往被忽略或边缘化。1922年，在《侨民》杂志的“妇女角”（মহিলা মজলিস, Mahila Majlis, Women's corner）栏目中，赫蒙托·乔托帕迪亚伊（হেমন্ত চট্টোপাধ্যায়, Hemanta Chattopadhyay）讨论了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封闭生活以及作为“低下和受压迫的……只能通过大声抗议来维持地位”的角色。长篇论述后，他在结尾勉强承认：

近来，女性似乎突然觉醒了，渴望突破父权制的枷锁和自身的倦怠，保持与美国女性同等的地位。在北京的大学里男女同校，这是史无前例的。在文化最发达的湖南，女性已获选举权，其他地方也在要求。男性也站出来支持女性争取受教育，很快中国女性就将不再落后于他国女性。^②

这一时期关于中印联系的讨论，既回应了印度内部的民族主义冲动，例如讨论印度通过佛教影响中国宗教和文化^③以及印度文学在中国^④；也对中国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威胁表示同情。对鸦片贸易的

① No author, “Chindeshe Shishu Palan riti (Child rearing in China)”, *Bamabodhini Patrika*, 3(3) (253), 1886, pp.243-244.

② Hemanta Chattopadhyay, “Chindesher NAari”, “Mahila Majlish”, *Prabashi*, 22 (1) (1), 1922, pp.96-102.

③ Kailash Nath Sinha, “Hiuen Tsang er Bangla Bhraman”, *Bharati*, 4 (2), 1880; Ramlal Sarkar, “Chine Dharma Charcha”, *Prabashi*, 7 (12), 1905.

④ Prabhat Kumar Muhopadhyay, “Chine Bharatiya Sahitya (Indian Literature in China)”, *Prabashi*, 25 (2) (5), 1930.

控诉从很早就囊括在内，正如1881年《巴罗蒂》^①杂志上的《在中国的死亡生意》所示：

为了经济利益毒害整个民族，这种盗窃心态闻所未闻……中国痛苦地哭喊不要吸鸦片。但英国商人绑住她的手，用大炮把鸦片灌进口中，还索要报酬。这就是英国人在中国的丰功伟业，尽管这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粉饰这场名副其实的抢劫。它使强国沦为弱国。^②

声援中国苦难的爆发也显然具有批判英国帝国主义态度的民族主义含义。还有一些文章讨论了为何曾令中国强大的价值观在外敌面前无济于事。1889年，《翁乔利》^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强调了中国过去的伟大，并将其衰落归咎于沉溺昔日辉煌。

世界曾长期沉溺于过去。欧洲也曾沉溺昔日辉煌，现在欧洲崛起了，抛弃深沉黑暗的旧根基，迈向新生活、新科学和新文学。宗教、社会和教育都受到了启蒙。那些追随欧洲脚步者同样受益。日本被西方文明的光芒照耀。印度因为英国影响也开始现代化。只有中国仍深陷过去。长久以来，无人知晓中国是醒是睡，是生

① 《巴罗蒂》(ভারতী, *Bharati*) 是1877年创办的孟加拉语月刊。泰戈尔的五哥乔蒂林德拉纳特·泰戈尔(জ্যোতিরি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 Jyotirindranath Tagore, 1849—1925)是创始人，大哥德维金德拉纳特·泰戈尔(দ্বিজে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 Dwijendranath Tagore, 1840—1926)是首位编辑。该杂志以传播知识和促进教育为目标。“ভারতী”一词既有“言辞”之意，又有“知识”之意，还指“印度的守护女神”，译者音译。——译者

② Editorial, “Chine Moroner Byabshay (The Death Business in China)”, *Bharati*, 5 (2), 1881, pp.93-100.

③ 《翁乔利》(অঞ্জলি, *Anjali*) 是1898年创立的孟加拉语月刊，旨在提高青少年教育水平。由于语言复杂和内容不够吸引学生，这本杂志未能长期存续。“অঞ্জলি”一词也具有多层含义，字面意思指的是装满花卉、树叶、檀香等各种供品的手势；又指在供奉文艺女神梭罗室伐蒂期间，献供物放置在神像脚下的手势，这一手势包含了谦逊、虔敬、纯净和谐的元素，象征着尊敬、崇拜者和崇拜对象的合一，翁乔利为译者音译。——译者

是死，是清醒还是混沌……也没有人靠得够近去一探究竟。^①

作者将这种封闭性与鸦片瘾联系起来，暴露了他的偏见。他声称印度切断了与背离现代化的“天朝上国”的联系，掩盖了印度自身的殖民地困境。

多数作者对中国没有一手资料，依赖其他杂志或西方游记写作。绍林德罗先生（শ্রী সৌরিন্দ্র, Sri Sourindra, 全名未曾透露）的长篇系列文章奇异地揭示了多重微妙之处。他在其中作为音乐旅者，在家庭争吵后离开印度，历经船难辗转抵达中国海岸。^②系列开篇描述作者遭到当地人冷遇，却因殖民地臣民身份在一位英国人身上找到了熟悉感。这位英国人给他传递了家乡消息，助其安顿下来。相比于他在“Chua Chu”（他没有明说指的是中国还是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地方）遇到的中国人，他与那位英国人更为亲近。他如此描述中国：

一个最古老的文明，其人民为了维护古老文化和独立与传统主义和迷信作斗争……但拥有优良品质，工业和农业堪称典范，工作能力堪称传奇，爱国是他们唯一的财富，孝敬是他们唯一的宗教，善行是他们唯一的敬奉。^③

在救命恩人家中康复之后，作者通过学语言和中国音乐，开始探索中国文化，以期让孟加拉人也理解。^④这部作品看似是真实的游记，但也可能纯属虚构，并且可能出自著名音乐学家绍林德罗·莫汉·泰戈尔（শৌরীন্দ্রমোহন ঠাকুর, Sourindra Mohon Tagore, 1840—1914）之手。他热

① Anonymous, “Chin-Porachinporotar porinam”, *Anjali*, 1 (1), April 1989, pp.40–42.

② Sarvani Gooptu, “Knowing Asia”, *Being Asian: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in Bengali Periodicals, 1860–1940* (Delhi: Routledge, 2022).

③ Sri Shou., “Sangeet Pathik (Traveller in Music)”, *Aryadarshan*, 1(3), 1874, p.140.

④ Details of this in Chapter 4, in Sarvani Gooptu, *Knowing Asia, Being Asian: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in Bengali Periodicals, 1860–1940*, *op. cit.*

衷提供一个背景语境来描述中国音乐的发展、衰落和变迁，其1875年的巨作《不同作者的印度音乐》(*Hindu Music from Various Authors*)根据各国音乐学者的著述，分析了印度音乐与外国音乐的关系，由此掌握了中国音乐及其与印度古典音乐联系的翔实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获得一等宝星勋章^①及其他荣誉。

除了在想象中旅行的人，还有一些真实的旅行者，如因杜·马多布·莫利克(ইন্দুমাধব মল্লিক, Indu Madhab Mullick, 1869—1917)，他经缅甸、马来亚和新加坡赴华，撰写游记《中国旅行》，叙述所见之人，描绘异于印度的中国风貌。当他在厦门登陆时，震惊于中国人是独立的，而外国人则为附庸，且大多被隔离在远离自由人群的岛上。^②除了这些家庭富裕的旅行者和因公出差者之外，还有在世纪之交英属印度军队士兵的记述。

义和团运动造成空前惨重的伤亡，不仅预示着清王朝统治终结，也影响了中国与更广阔世界的关系。那些热衷阅读西方报刊的印度人，亲眼目睹了世纪之交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他们既同情中国逝去的辉煌，又钦佩日本纪律严明的军事力量，左右为难。所有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学者都同意这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因为它不仅影响深远，还是一个“富有人性的故事”，许多目击者留下了观点鲜明、充满偏见而又引人入胜的记述。^③当时，有三名赴华的英属印度军队士兵：凯达尔纳特·邦多帕迪亚伊(কেদারনাথ বন্দ্যোপাধ্যায়，

① 宝星勋章设立于清末，用于表彰在特定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中外人士。同治二年(1863)首次颁发金宝星和银功牌勋章，颁授给协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法等西方国家的雇佣军军官。光绪七年(1881)清政府进一步设立双龙宝星勋章，分为五等。双龙宝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奖励勋章，也是清朝现代意义上的奖励制度的一部分。——译者

② Indu Madhab Mullick, *Chin Bhraman (Travels in China)* (Calcutta: S. C. Majumdar, 1906).

③ Diana Preston, op. cit.; John Keay, *Empire's end: 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from high Colonialism to Hongkong* (New York: Scribner, 1997); Michael Wood, *The Story of China: A portrait of a Civilization and its people*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20); Gal Gvili, *Imagining India in Modern China: Literary Decolonisation and the Imperial Unconscious 1895-196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Kedarnath Bandopadhyay)、恰鲁·钱德拉·邦多帕迪亚伊(চারুচন্দ্র বন্দ্যোপাধ্যায়, Charu Chandra Bandopadhyay)和阿舒托什·罗伊(আশুতোষ রায়, Ashutosh Roy)。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记述不同于通常的士兵故事,他们作为世界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识盖过了隶属胜利军队的自豪感。

凯达尔纳特·邦多帕迪亚伊在1903年和1904年的《巴罗蒂》杂志上发表了两篇长文,名为《中国旅行者的来信》。^①奇怪的是,他在文中提到了自己在中国,但没有谈及细节,可能是因为害怕政府报复。直到1933年,他才在《五光十色》^②杂志上的文章《中国回忆》(*Memories of China*)中真正填补了这些空白。他在这篇文章中的写作风格相当独特——戏谑且常常带有讽刺意味。“中国战役”(China campaign)^③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国内的反殖民运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印度人的忠诚态度。这种改变相对于一战士兵记述中所体现得更为明显。^④有趣的是,他将两个时期的中日冲突联系起来,表现出对爱国主义理想的模糊感受。这种爱国主义理想是他在日本人身上发现的,然而他的言辞中交织着同情和担忧:

1900年2月,我们抵达中国北方的天津。全世界白人都决心对中国开战,因为后者无法忍受外国人在他们国家的存在^⑤。中国人对传教士的存在和教义表示反感。这是一个保守的民族,喜欢固守传统,无法忍受外来干涉,因为他们不相信别人能比他们懂

① Kedarnath Bandopadhyay, “Chin Prabashir Patra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in China)”, *Bharati*, 27(12), 1903, pp.1186-1193, 28(1); 1904, pp.46-61.

② 《五光十色》(*বিশিষ্টা, Bichitra*)是1915年创立的孟加拉语月刊,是当时孟加拉文学和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以多样性和广泛性为特点。——译者

③ 指1900年发生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译者

④ Sarvani Gooptu, *At the Warfront during the Mesopotamia Campaign in 1924-1918: Soldiers' Reminiscences in Bengali periodicals*, vol XXXIX(Jan 2021-Dec 2021), no. 1&2 (online version).

⑤ 凯达尔纳特在此处用了一个孟加拉语的谚语,意思是“无法忍受气味”。

得更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对所谓“伟人”^①来说，传播知识和驱除黑暗是势在必行的。患者何曾自愿接受手术？为了改善病情，必须强迫他接受手术。由于无法阻止干预，“恶人”^②只好诉诸暴力。为了报复，所有白种人都怒不可遏，并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进行手术。在那种背景下，像我们这样的好人也受到了召唤。

当他的团被派往那里时，他继续写道：

大量的中国人已被送往天国，因此行动大体已经完成……接下来只是讨论策略和政策来相互争功。^③那些仓皇而逃的中国人遗弃了富丽堂皇的房屋，我们进去了，安卧于他们舒适的床榻之上。

这种说法显示出他对系统性亵渎中国“封闭的神圣空间”的敏感性，后来的历史学家如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谈到了这一点。洛弗尔写道：“士兵们在王朝最隐秘的庙宇周围打曲棍球，搜掠皇帝皇后的私邸，在皇位上闲坐。他们这些亵渎行为被捕捉在柯达胶卷相机上，震撼了祖国的观众。”^④

这种“震撼”至少在凯达尔纳特的笔下确实带有一丝悲哀。他本人作为其中一员，用一种遗憾的讽刺笔调描写了这些“外国士兵”和“帝国官员”的不当行为。凯达尔纳特在其1903年和1933年的文章中都认为，日本的爱国主义是其在20世纪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他将中国和印度归为一类，认为它们需要从中汲取教训。

另一位士兵，恰鲁·钱德拉·邦多帕迪亚伊，在1905年同一期的

① 讽刺地指被派来“治疗”中国敌对情绪的外国军队。

② 西方人这样称呼义和团革命者，而凯达尔纳特却避免辱骂他们，尽管作为一个殖民地臣民，他被迫成为英属印度军队的一员。

③ Kedarnath Bandopadhyay, “Chiner Smriti (Memories of China)”, *Bichitra*, 6 (2) (6), 1933, p.732.

④ Julia Lovell,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London: Picador), 2011, p.279.

《巴罗蒂》杂志中发表的《在中国》一文中，流露出对中国的同情。^①他写到自己如何作为军需部高级文员随英军前往中国：“当东西方各国出于作为文明国家的骄傲吹响对华战鼓时……我很高兴，我，一个足不出户的孟加拉人，得到了机会花别人的钱拜访异国他乡，并目睹一场战争。”

这次旅行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游历异国（由他人出资）的途径，更是一种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政策给孟加拉人贴上缺乏勇气和尚武精神标签的个人抗议。“不幸的是，英国政府剥夺了孟加拉人参战的权利，并且百年来不断在我们耳边灌输懦弱的污蔑，使我们自我否定。我通过直面战场来反复自我考验，并确信，尽管战雷滚滚让我焦虑，但我的心保持平静。”

恰鲁虽属英军，但正因英方阴谋而被迫“远离”战场，这反而给了他一种探索中国和中国人的自由感。“我唯一的同伴是一个叫梁福^②的中国人，英国人雇他来当间谍。自从我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我就对他出卖自己国家机密给外国的背叛行径感到恼火。”恰鲁尽量避免与这位间谍为伍，因为他感觉梁福与他攀谈只是为了套取机密。他注意到梁福每天都会在房间里用中文写一些东西，然后烧掉纸张。这让他怀疑梁福的去向和背后的原因，但梁福总是巧妙地甩掉他。一天晚上，他发现梁福把文件落在了桌上。凭借有限的中文知识，他能够辨认出一些词，比如“笛诗”^③“爱”和“中秋节”。他心生困惑，但是确信有异。战争结束后，俄国人占领了满洲，其他外国列强宣布和平，营地还在，但外出行动变得更容易了。正值恰鲁思乡欲归之际，他收到一封家书，得知年轻的妻子已经染疫去世。无处诉说悲伤的他开始在镇上漫步，游历佛寺。一次，他偶然遇到了一群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骚乱，一位中国少女收留了他，把他从欧洲人的怒火中救了出来。问

① Charu Chandra Bandopadhyay, “Chin Deshe (In China)”, *Bharati*, pp.310-316.

② 原文“Liang Fu”，译者音译。——译者

③ 原文“Tish”，后文显示是梁福妹妹的名字，译者音译。——译者

及姓名，她回答说叫“笛诗”，他才发现她是梁福之妹。笛诗劝他在中秋节庆期间远离营地。困惑不解的恰鲁回到了营地，决心查个究竟。节日那天破晓，他正在犹豫是否要去找营地军官，让他调查梁福，竟发现笛诗在营地里鬼鬼祟祟地走动。问她在做什么，她坦言，因为自己已经爱上了他，所以特来提醒他，梁福和她是爱国者，密谋炸毁营地，已在各房安置炸药，准备同归于尽。恰鲁不让她这么做，从她手中夺走了火柴，使她免受指挥官的怒火。这篇文章最不寻常的地方是，他在结尾写道，自己娶了笛诗并把她带回了印度。^①

恰鲁所写的故事可能有虚有实，但抓住了义和团运动的本质。它还追踪了作者心态的转变，最初是一个利用军职渴望在异国冒险的青年，到后来却同情为了摆脱“洋鬼子”而战的中国兄妹的爱国情怀。他也无意中唤起了两个被压迫民族——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共鸣，尽管他属于前来营救被囚禁西方人的队伍，却最终选择站在了囚禁者一边。他几乎对自己对长官的所谓背叛毫无愧疚，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他却与笛诗一见如故，甚至要将她娶进门。他对这位中国女性怀有敬意，因为她有勇气公开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而他却做不到。整个故事围绕着最初的主线展开，即他作为一支强大军队的一员，去解救八个被义和团包围在使馆区内的强国，那里共有十一个国家（美国、奥匈帝国、比利时、大英帝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日本、俄国和西班牙）被围困。对恰鲁来说，印度士兵作为八国联军的一部分成功解围这一事实，最终并没有那么重要。相比之下，他更看重的是表达与中国起义者，或至少与其中一人的亚洲团结精神。

第三位士兵阿舒托什·罗伊于1910年在英语期刊《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上写道，他与另外两位同伴S. C. 博塔恰里利（S. C. Bhattacharya）和A. D. 查特吉（A. D. Chatterjee）一起前往“镇压义和团起义，这一宗派起义最终演变为一场民族起义，而中国人民顽强地

^① Charu Chandra Bandopadhyay, "Chin Deshe (In China)", *Bharati*, pp.310-316.

抗击了世界七大强国。”^①罗伊曾在华北居住了三年，他在同时期的孟加拉语杂志《侨民》中写到中国人的某些品质，是这些品质使之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对国家的热爱至高无上。尽管内部纷争，但面对外敌，他们总是团结一致。他们憎恨所有外族，称所有外国人为‘鬼子’。”

但在罗伊看来，这种对外来新事物不分好歹的排斥，最终导致了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落后。他指出，中国必须像日本一样，适应世界流行的科学变革，才能取得成功。“中国人勤劳、聪明、富于创新……非常宽容，且文化先进……中国人之所以精神强大，是因为社会没有阶级歧视。”^②

农业和工业的自给自足是中国人的另一所长。据罗伊所说，中国人的自尊心使他们在各个必要的方面都自我鞭策，以求上进。“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受过教育，至少是受过基本教育，文盲罕见。”罗伊对他们坚韧的品格感到惊讶，正是这种性格让他们坚忍且勤劳。关键在于，在这两篇文章中，罗伊并没有写他们的军事行动或政治阴谋，而是向读者介绍了这里的风土人情。他的在华身份并不是敌方战斗人员，而是一个有着佛教渊源、友好亲近的旅客（作为来自佛陀出生地的印度人，而非天生的佛教徒），由此建立起一种与西方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的纽带。

中国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发生的政治和文化动荡，在身居中国以及远方的孟加拉人的写作中都有所反映。拉姆拉尔·索尔卡尔（**রামলাল সরকার**, Ramlal Sarkar）是一位在北京定居了十多年的孟加拉牙医，他的家人住在缅甸。他从1905年起就开始连载关于中国生活各个方面的文章。1911—1912年，索尔卡尔医生在《侨民》上发表了一个12期的

① Ashutosh Roy, “China and its people”, *The Modern Review*, 8(4) 1910, pp.427-433; “General aspects and natural resources of China”, *The Modern Review*, 8(5), 1910, pp.528-530; “The people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 Modern Review*, 8(6), 1910, pp.601-604.

② Ashutosh Roy, “Amar Chin-Prabash (Domiciled in China)”, *Prabashi*, 10 (2) (4), 1910, p.459.

系列文章《中国的政治革命》，试图分析那里的政治变局。他写道，自己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1911年决定把家人从缅甸接过来，但一些当地朋友劝他不要这样做，说局势正在变得不安稳。据索尔卡尔说，由于对政府和皇室的普遍不满，这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国，这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也显示了人民的决心。他的文章极具重要性和趣味性，因为它们逐个地区、逐个区域地讨论了共和国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并展示国家的“生命力”。^①索尔卡尔特别强调，他与中国当地人产生了深厚的共鸣，这与“Tengiye”（可能是天津）的英国领事馆官员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医院和住所在那里。这些官员一看到革命者就逃跑了。这位仁医留了下来，给予了許多害怕革命势力的当地中国人勇气和庇护。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我不得打消在袭击当晚逃跑的一切念头，因为没有人会给我辩解的机会，毕竟印度人，特别是孟加拉人，一向以懦弱和胆小闻名”^②。他写道，就像在改革时期兴办男女学校一样，革命党人也利用与当地民众的联系，组织了游行和集会，鼓舞人心的演讲有助于“在稚嫩的心灵中播下共和理想的种子”。^③当英国专员霍威尔（Howell）坚持要求他陪同自己与弗雷泽（Frazer）牧师还有领事馆工作人员戴路信^④前往八莫^⑤时，索尔卡尔妥协了。他们的团队中加入了大量被革命者所散布的谣言吓坏的中国人。谣言说，中国人在西藏边境被戴头巾的印度士兵和克钦部落成员袭击了。在索尔卡尔离开天津之前，他写了一份关于革命党人袭击该市的完整报告，并向八莫发送电报，因为有关中国事件的任何消息都不允许发布。巧合的是，当他和同伴抵达中缅边境时，那份电报也送到了宪兵首脑手中。随后，奥蒙德上尉（Captain

① Ramlal Sarkar, "Chine Rashtra Biplab (Political revolution in China)", *Prabashi*, 9 issues between (12 (1) (2)-12 (2)(6), 1912. pp.155, 289, 366, 491, 590/12, 259, 251, 364.

② Ramlal Sarkar, "Chine Rashtra Biplab", *Prabashi*, 12 (1) (2), p.163.

③ Ramlal Sarkar, *op. cit.*, 12 (1) (2), p.157.

④ 原文 "Tai Lu Sin", 译者音译。——译者

⑤ 八莫 (Bhamo): 缅甸北部克钦邦的重要贸易城市，缅北华人称新街，地处旧中印公路。——译者

Ormond) 在西姆拉 (Simla) 点头批准在《仰光公报》(Rangoon Gazette) 上发表这则消息, 这为索尔卡尔带来了声誉和一些酬金。领事返回天津后, 索尔卡尔也想回中国, 尽管朋友和家人恳求他留在八莫工作。他想要追踪中国的政治巨变, 并在孟加拉报纸上进行报道。在八莫时, 一个广东代表团从上海带来消息, 说清朝皇帝已逃离北京, 整个国家落入革命党人手中。居住在八莫和曼德勒^①的华人, 升起了国旗, 焚烧旧物, 剪去辫子。很多华人志愿者从仰光和曼德勒赶来, 索尔卡尔也随他们一起前往天津。在过境时, 他注意到当地人立竿见影的态度变化。过去他们对外国人一直非常恭敬, 但现在明显流露出攻击性。据他所言, 许多以前无足轻重的人如今在革命政府中被委以重任。

懒汉、流浪汉和鸦片瘾君子现在纷纷入伍, 每月领取6分钱或13卢比的薪水。现在很难找到劳工、仆人和马车夫了……许多乡绅被军队、警察或司法部门雇佣, 甚至有人靠瓜分政府机构和法庭赃款发了财……天津的革命党领袖张文光^②甚至下令外表也要改变。最初几个月, 共和国的士兵和公务员都戴着蓝色头巾, 但在一个月内, 就改为日式帽子、翻领短衣和宽松裤子。所有舰艇和海军人员都穿着带有黄铜大纽扣的大衣。

索尔卡尔详细列举了不同类型士兵的服装。他们的服装颜色每三个月更换一次——二月到四月为黄色, 五月到七月为白色, 八月到十月为蓝色, 十一月到次年一月为蓝色的厚羊毛制服。不同于以往高等军官乘轿, 由随行执旗护送出行, 现在各级士兵都骑马出行。在宗教领域, 索尔卡尔注意到了一种变化, 他说这是新政府的鞭策带来的, 但在他

① 曼德勒 (Mandalay): 缅甸第二大城市, 因背靠曼德勒山而得名。又因缅甸古都阿瓦在其近郊, 旅缅甸华侨称其为瓦城。曼德勒是缅甸华人主要聚居地, 所以也称华城。——译者

② 原文 Chang Weng Kwang, 译者音译。——译者

看来这是有益的、现代化的。印度可以从这种铲除庙宇中各种神祇崇拜文化的做法中学到很多。他感叹道：

在中国，寺庙中用稻草和竹子制成的神像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造福人民的纺车……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去除所有无用的宗教装饰，净化印度教呢？这将使我们在所有文明社会中受到尊敬，而不是被称为“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

关于新共和国的行政实践，索尔卡尔医生当时的描述与后来学者们的结论不谋而合，即弱国之祸在于军阀和地方势力的威胁。这种威胁“将共和国变成了专制独裁的统治，也可以称为戒严。”^①他提供了生动的细节和实例，证明了许多人在新政权手中受尽折磨。

比诺伊·库马尔·索尔卡尔（বিনয় কুমার সরকার, Benoy Kumar Sarkar, 1887—1949），印度博学家、杰出的国际关系分析家，于1915年在《侨民》上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自治的未来》的文章，依据“英文报纸文章”写作。文章分析了当时在中国盛行的三股不同政治势力——一是“企图恢复清朝统治”的君主派；二是自称共和派的袁世凯，但在索尔卡尔看来，他真正觊觎的是其追随者所拥护的最高统治者之位；三是孙中山领导的“极端共和派”，力图推翻袁世凯。^②有趣的是，索尔卡尔并不满足于仅仅引用英文报纸，而是通过巧妙的分析表明“盘踞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势力希望内乱持续，并且实际上希望复辟软弱的君主制，尽管他们嘴上声称支持共和国。难怪他们一边假装是新郎的姑妈，一边又假装是新娘的姨妈。”^③他所担心的是，若非欧洲正在爆发世界大战，德、法、俄、日、英等列强早已在中国的

① Ramlal Sarkar, *op. cit.*, 12 (1) (3), p.377.

② Benoy Kumar Sarkar, “Cheena Swarajer Bhabishyat (The future of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of China)”, *Prabashi*, 15 (2) (5), 1915, pp.499-504.

③ *Ibid.*, p.500.

港口为了领土和经济特权而相互争斗，但同时又害怕中国的虚弱会导致日本实力的增强。1916年，索尔卡尔在上海，他描述了第三次国家革命，袁世凯宣布自己为“名义上的皇帝”，而“中华民国已经在纸面上告终”。用索尔卡尔的话来说，“12月15日是新帝国的第一天”，但“登基仪式将按照历法举行”。袁世凯随即收到一封信，来自以日本为首的世界主要列强，劝告他不要登基称帝。根据索尔卡尔的说法，这并不是说这些欧洲列强与日本联合起来了，事实上，他们对日本的鲁莽冒失颇感恼火，却被硝烟四起的世界大战掣肘。索尔卡尔将袁世凯比作莎士比亚戏剧中与内心双重自我斗争的角色，并引用袁世凯的宣言，称他将在未来的活动中“如拱北辰”，但“到了三月，他不得不放弃称帝之梦”。实际上索尔卡尔认为，云南宣布抵制袁世凯的决定是“中国内部尚有生机”的迹象。^①

1919年5月4日的反帝国主义抗议运动不仅对中国青年而且对亚洲所有反帝运动都具有深远的社会和文化影响。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许多文章讨论了中国的新觉醒及其如何激励印度人。普罗富尔·钱德拉·罗伊（প্রফুল্ল চন্দ্র রায়, Prafulla Chandra Roy, 1861—1944）的《新中国与孟加拉》指明，正是如下这些价值观帮助中国冲破了数百年迷信的桎梏，并从上个世纪末西化的日本带来的屈辱失败中逐渐恢复。首先是宗教宽容。“过去三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没有导致社会分裂的种姓制度或歧视。过去两千年来，最高行政职位皆由公开考试选贤举能。不论出身，只论才干，普通人也能做官。”^②其次，中国的宗教从未导致任何暴力或宗教偏狭。“自古以来，他们就明白宗教的外在习俗和内在精神信仰无关。所以他们的宗教观念非常宽容……即便是文明的欧洲也无法在这方面与中国相比。”

他随后讨论了新文化运动，以及学生在大众教育传播中的角色，

① Benoy Kumar Sarkar, “Chin Swarajer Bhabishyat”, *op. cit.*.

② Prafulla Chandra Roy, “Navya Chin O Bangala (New China and Bengal)”, *Prabashi*, 29 (2) (1), 1929, p.81.

包括通过直接互动、讲座、办立成人夜校以及将古籍译为白话文等方式。“中国的这场青年运动使得近400种期刊焕发生机。这些期刊不谈政治或宗教，只讨论如何改善国家状况、扫除文盲……目前孟加拉也不乏此类期刊，但它们只关心政治和青年事务，远不及中国期刊对国家发展规划的关切。”^①在他看来，这种对国家进步的关注还得益于另外两点。首先，那些出国深造的中国人，不会像印度人那样，回国后便看低同胞；其次，他们不认为任何工作有损尊严。他总结道：“与我们国家不同，中国青年中的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他们的青年也不像我们那样，沉溺于西方带到印度的个人主义享乐和轻松的消费主义。我恳请印度人向中国青年学习，遵循中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实现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②

1935年，克希蒂什·钱德拉·班纳吉（**ক্ষিতীশ চন্দ্র ব্যানার্জী**, Kshitish Chandra Banerjee）骑自行车游历中国等地，并在广州讨论了中国政治局势，称广州是“孙中山先生播下革命种子的地方，现为华南政务委员会的所在地。该委员会独立管理南方的五个大省，尽管它们形式上仍效忠于中央政府”。^③他还写到了在中国青年团会议上遇到的大学生，他们渴望了解印度及其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中国普通民众对印度的不信任，是缘于那些“外表邈邈，行为粗鲁”的锡克教警察和看守。据他所说，令人遗憾的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唯一新闻是关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骚乱的，他呼吁在华的印度有识之士应该努力消除普遍存在的错误印象。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就像古代的朝圣者一样，通过旅行探索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他向东游历东亚和东南亚，后来追随他脚步的人众多。他的许多旅程都被记录在当时的文学期刊中。从1923年起，《欢

① Prafulla Chandra Roy, “Navya Chin O Bangala (New China and Bengal)”, *Prabashi*, 29 (2) (1), 1929, pp.83-84.

② Ibid., pp.90-91.

③ Kshitish Chandra Banerjee Globe Trotter, *My Travels in the East* (Calcutta: Chatterjee and Sons), 1936, pp.57-58.

喜市场报》便详尽追踪泰戈尔在国内外的访问。1923年至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日本和东南亚期间，《欢喜市场报》评论说，他在对中国学生的演讲中强调了所有种族的团结和人类的兄弟情谊，他说：“我们正在开辟道路——不是为了任何自我扩张或者权力，只是为了兄弟情谊。现今通讯便捷我们得以相会，但我们的灵魂仍然孤立。尽管中印团结之路障碍重重，但一定会走出一条路来。”^①

那次访问之后，《欢喜市场报》表示，泰戈尔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亚洲的理想与西方的物质主义理想不同。亚洲各地逐渐觉醒，不久将会有一股新的生命力量从亚洲古老的传统中诞生。”^②

泰戈尔的那次访问在华受到热烈欢迎，这一点从《欢喜市场报》引用各大中国报纸的报道可见一斑：《北京导报》《华北正报》《北京日报》《东方时报》^③等。泰戈尔在1924年发表于《印度大地》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将这种欢迎比作“婚礼上新郎派对的欢迎”。^④然而他也坦言，有些人反对一位印度诗人的到来，因为他宣扬的是受佛教启发的精神非物质主义，可能会动摇他们刚建立起来的信心。泰戈尔声称他们是少数派，是共产主义者，而且他们也并未对他出言不逊。同年，《侨民》杂志发表了《中日旅行记》，泰戈尔在其中写道，这些旅行并

① Chittaranjan Bandopadhyay, compiler, “Chine Rabindranath, Bideshi Tar”, *Anandabazar Patrika* (henceforth ABP), 11 June 1924, in *Rabindra Prasanga: Anandabazar Patrika I* (Calcutta: Ananda Publishers), 1993, p.499.

② Rangoon e Rabindranath, ABP, 15 July, 1924, *op. cit.*, p.500.

③ 《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是1918年美国人在北京创办的英文报纸，旨在报道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新闻，主要面向外国读者，特别是驻华的西方外交官、商人和其他外籍人士。《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是日本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1919年在北京创刊，由日本记者鹭泽吉创办并主持社务。曾和《北京导报》进行激烈的竞争和争论。以在华的西方外交人士和商人为主要发行对象，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辩护。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后，因中国政治中心南移，销售发行日渐困难，于1930年3月26日停刊。《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是英国人1903年在北京创办的英文报纸。《东方时报》(*Far Eastern Times*)是中国国民党奉系军阀创办的报刊。1923年创刊于北京。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张作霖的顾问、英国记者辛博森(Lenox Simpson)为创办人。——译者

④ Rabindra Nath Tagore, “Chin O Japan”, *Bharatbarsha*, 12 (1) (3) (1924: 425).

非出于任何宣传目的，而是为了实现长期以来想要了解古老文明生命力的梦想。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革命、侵略、内战等风风雨雨，但庞大人口的内在力量丝毫未减。人们应该像朝圣一样来到这个国家，向它致敬。^①

泰戈尔的访问促成了大量旅行者前往中国。1924年至1947年间，除前述文章外，还有拉姆纳特·比什瓦什（রামনাথ বিশ্বাস, Ramnath Biswas, 1894—1955）和比默尔·穆克吉（বিমল মুখোপাধ্যায়, Bimal Mukherjee, 1903—1996）的游记。印度独立后，更多旅行者前往中国，无论是作为文化代表团还是个人旅行，都留下了他们的记录，如吉塔·邦多帕迪亚伊（গীতা বন্দ্যোপাধ্যায়, Gita Bandopadhyay）、莫诺杰·巴苏（মনোজ বসু, Manoj Basu, 1901—1987）、克希蒂什·巴苏（ক্ষিতীশ বসু, Kshitish Basu）、绍钦德罗纳特·申古普托（শচীন্দ্রনাথ সেনগুপ্ত, Sachindranath Sengupta, 1891—1961）、德布布罗托·比什瓦什（দেবব্রত বিশ্বাস, Debabrata Biswas, 1911—1980）、比琼拉杰·乔托帕迪亚伊（বিজনরাজ চট্টোপাধ্যায়, Bijonraj Chattopadhyay）和黑曼戈·比什瓦什（হেমাঙ্গ বিশ্বাস, Hemango Biswas, 1912—1987）^②。从而证明了在整个20世纪，“新中国”吸引了许多人的兴趣，这得益于印度政府官方推动的良好关系。《阿姆利德市场报》^③提到莫诺杰·巴苏的《我眼中的中国》（*চীন দেখে এলাম, China through my eyes*）时，称其是“对新中国的真实写照，并融合了八卦和幽默”，还断言该书一定会“消除对新中国的误解和疑虑”，并且“加强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文化纽带”。^④

语言学家、作家舒尼蒂·库马尔·乔托帕迪亚伊（সুনীতি কুমার

① Rabindranath Tagore, “Chin O Japaner Bhraman Bibaran”, *Prabashi*, 24 (2) (1), 1924, pp.89-90.

② Barnali Chanda, “Travel as a metaphor: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travelogues on China written in Bengali”, *Analysis* (Delhi: India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no 77, April 2019, pp.1-5.

③ 《阿姆利德市场报》（*অমৃতবাজার পত্রিকা, Amrita Bazar Patrika*）是印度最古老的日报之一，创刊于1868年，最初以孟加拉语出版，后来演变为英语版。该报在印度新闻业的发展和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印度独立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译者

④ Manoj Basu, *Chin Dekhe Elam* (Kolkata: Bengal Publishers), 1955, back cover.

চট্টোপাধ্যায়, Suniti Kumar Chattopadhyay, 1890—1977) 很好地总结道：“中印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虽经历了疏远和遗忘，但总是能重拾记忆，重建物质和精神上的联系。”^①

今天需要强调的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回归到世界主义的互联互通视角，来解读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影响。我试图通过研读知名和非知名作家在本土文学期刊中发表的文章，强调要从过去的思想传统中发掘可以替代当前沙文主义话语的观点，让今天的印度人能够“重拾旧友谊，觅得通往永恒真理的古老路径”^②，以实现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福祉。

① Suniti Kumar Chattopadhyay, “Chin O Bharat: Bharater opor Prachin Chiner Prabhav(India and China: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a over India)”, Baridbaran Ghosh ed. *Ogranthito Suniti Kumar (Unpublished Suniti Kumar)* (Calcutta: Deep Prakashan), 2009, pp.717–730.

② Ibid.